

审美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丛书 王岳川 胡鹏林 主编

胡鹏林 著

# 文学现代性

WENXUE XIANDAIXING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审

I106/115

2007

胡  
鹏  
林  
著

文学现代性丛书 王岳川 胡鹏林 主编

# 文学现代性

WENXUE XIANDAI XING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现代性/胡鹏林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7-5004-6024-4

I. 文… II. 胡… III.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世界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9205 号

责任编辑 胡 兰  
责任校对 韩天炜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戴 宽

---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华审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0.5

插 页 2

字 数 290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总 序 一

王岳川

全球化时代不同身份和立场的学者为“现代性”(modernity)问题而纷争不已,批判者和推进者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话语圈层而莫衷一是。现代性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中同样形成一个争论不休的学术前沿话语,吸引了众多的学人为之阐释和对话。那么,究竟“现代性”具有怎样的现实形态和话语方式呢?这一影响了整个世界现代进程的话语在历史脉络中占据怎样的地形图呢?在我看来,只有将“现代性”放进传统和现代之间的紧张关系中,或将现代性放在世俗性与神性的关系网中,甚至将现代性放在与“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的复杂关系中,才能厘清其基本内涵和话语形态。

## 全球“现代性”话语的基本内涵

在全球化浪潮中,科技经济一体化和热核战争的威胁使整个人类休戚相关、荣辱与共。不同的价值立场使得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文化宗教层面的反全球化的多元文化主义潮流。这一切与现

现代性在全球成为一个人类发展的“巨型神化”大有关系。大体上说，现代性是在中世纪结束以后开始的，当时的神性中心话语逐渐发展成世俗性话语，因此现代性与神性有着非此不可的联系。现代性问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阐释：

(1) 作为时间延伸观的现代性。现代性 modernity 是现代 modern 的衍生词，而后者源于拉丁文中的 modo，意指“刚才”。这一说法与中世纪基督教中末世教义时间观关系紧密，即在此生与彼岸、光明与黑暗、觉悟与愚昧的二元对立中昭示出“现代/古代”的二分，二元对立的后项成为被贬抑的对象。

(2) 作为可持续世俗化进程的现代性。以新教伦理为代表的世俗性与中世纪神性法则的对抗，成为现代性最有活力和争议的场域。在现代性的摧枯拉朽的权力话语和意识形态冲击中，现代性将中世纪神学中心变成不合法的边缘存在形式，于是几个世纪张扬人中心主义的世俗化过程成为全球最壮丽的历史景观。然而，当代以大卫·格里芬为代表的一批科学家或神学家，却借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发难，在《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的“前言”中，格里芬认为：“后现代一词在近这些年来迅速流传，这说明人们越来越不满足于现代性，我们尔后应该抛弃现代性，事实上，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们及地球上的大多数生命都将难以逃脱毁灭的命运。”将问题提到“人类难逃厄运”的高度，对现代性的批判意识可以说相当突出。其实，中世纪的宗教神学的中心地位是被现代性长期占据了，当代风靡一时的后现代主义以彻底颠覆的方式消解现代性，于是，宗教家们借机重新提出神学中心性诉求，其核心概念是重建后现代主义宗教。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因为它在反中心主义神学前提下对后现代的理解存在相当严重的问题。

(3) 作为推进技术主义物化时代而贬低人文价值的现代性。

为什么在现代性理性主义高歌猛进的 18 世纪，出现了以鲍姆嘉通为代表的“感性学”？为什么西美尔在 20 世纪初期，看到了现代性的致命弊端而提出现代文化问题？现代性导致了人类基本生存问题的根本转型，使得人文主义日益走向虚无主义。不难看到，20 世纪初人类生活已经出现了“传统与现代”的重大裂痕，理性主义已经信誉扫地，虚无主义正在成为人类生活中的灰色背景。人们越来越感觉到自己所能探讨和揭示的唯一现实，就是自己的心灵和思想的现实。重视时间导致了城市约会和商定时间的准确性，金钱与手表在对人的生活的约束中，造成时间就是金钱的现代意识；货币使社会出现虚假的平等，并以成为一切价值的公分母而自居；现代人的身体与感觉使人失去了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传统式的和谐，而进入一种现代性存在的短暂、偶然、荒诞的同义词；现代人日益加大他人与自我之间的距离，孤独和逃避责任成为现代人一份沉重的记忆。作为关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科层组织范畴的现代性，在社会制度和形式组织的层面上标志现代性社会制度的全球化通行，与审美现代性和艺术现代性的着重感性、用感性向理性异化的抗争不同，作为制度现代性要求一种普适的平等和自由原则，但是却又在精神领域张扬人格现代性和精神现代性，于是审美现代性和制度现代性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内在的悖论，并不断演化为压制力量的制度现代性和自由精神的审美现代性的冲突。

简单地说，尽管对“现代性”的界定林林总总，说法难定一尊，态度褒贬不一，但化约而言，大抵主要可分为两个维度：一是制度现代性，表征为“人是手段”——强调工具理性和历史理性、必然、整体、技术、秩序和利润。二是审美现代性，表征为“人是目的”——张扬人文理性和个体精神、偶然、边缘、审美、感性和反叛。制度现代性在工具理性日益强盛之际，不期然地将

人逐渐地片面化和工具化，人成为工业社会中被异化的非人。审美现代性出场，对制度现代性的弊端加以批判、嘲弄和颠覆。艺术终于使自己的不自在成为现存社会的歌颂者和怂恿者，以丑的方式和形态对现实制度秩序加以反讽和褻渎。审美现代性力求寻找人的整体性，反抗制度现代性使人变成碎片和成为工业社会大机器中的零件，使人丧失了自由，丧失了个体的丰满性，丧失了诗意的生活氛围。当然，审美现代性也不是一味地批判，也有对现实加以歌颂的功能，一方面可以像萧条时期的美国好莱坞的电影那样成为制造梦幻的工厂；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成为批判现实的一个先锋维度。

换言之，制度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二者的关系，充满了对立统一的复杂性。制度现代性是维护社会秩序和话语权力基本稳定的方式，审美现代性则是针对制度现代性的弊端而关注人们的灵魂。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永远是以个体的方式阐明对人生、世界、生命进程的基本看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审美现代性在中国发生了变异，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时代，审美现代性以诗意方式来赞美人生而成为审美的艺术，但由于中国制度现代性立足未稳，审美现代性发展并冲击了制度现代性的建立，于是很快演化为调皮的褻渎的文化形态，并与后现代主义合流，成为一种世俗化的、平面化的反现代性思潮。

###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问题博弈域

现代思想与现代人存在的语境与诗学意义的延展中，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成为 20 世纪一个重要的问题，不管是认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具有内在的相通性，还是认为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中断或延伸，都将现代性作为重要的知识系谱中的问题，置于

20 世纪学术框架中，使其成为 20 世纪文化哲学阐释的有效代码。

就历史踪迹而言，现代性从启蒙运动中诞生以后，就不断遭到进攻。近代西方哲人在知识的来源及其可靠性问题上发生了理性论和经验论的争论。康德企图从休谟怀疑论中超越出来，重新为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建构一套完整的知识理论，达到对经验论与理性论的知识理论的综合和深化。黑格尔重视理性和历史，看似在弘扬启蒙精神，其实已置下现代性必然终结的历史谶语。因为当黑格尔高扬“理性”的反思力，将理性提到“绝对理性”的高度时，他就从他辩证法的锁孔里窥到这个理性将被罢黜的未来处境。同时，他展示历史性大旗，然而，在历史性“时间”结构中，一切都不可能永恒，一切都注定将被更新的东西所替代，一切都将走向自己的反面——终结。时间已经内蕴着由过去、现在、未来相交织的历史链条，因此，黑格尔时代的“现代性”必将被“后现代性”或“后形而上学思维”所摒弃。

现代思想史上，世纪之交的尼采最为敏锐地意识到西方的理性主义的危机，并宣告理性与上帝同时覆亡。因为理性在抽去上帝脚下基石的同时，也抽去了自己脚下的基石。换言之，理性打倒了上帝，而自己也异化为专制、保守、落后的东西。在理性主义哲学渐趋式微之后，上帝死了。尼采进而用悲剧性神话来与由主体支撑的理性相对抗，用“他者”抵消“同一性”，使人在体验中超越概念和理性，从现象界的充足理由律的互相必然关系中解脱出来，窥视到世界的本质。尼采在宣告现代性终结的同时，又激荡出了以彻底反传统、反理性、反整体性为标志的反现代性哲学诗学思潮。西美尔在现代性问题出现的世纪之初，率先揭示了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困境。他是在 20 世纪初叶就能够一针见血提出一系列重要命题和透视现代性悲剧文化现象的社会学家。

或许可以说，西美尔被确定为第一位“现代性社会学家”，他对现代性问题的深入探讨，使我有理由认为，他已经把握了现代社会中个体和群体的心性状态和文化制度的形式结构——他通过对货币的文化哲学的分析，对都市人的身心焦虑的形态的社会学梳理，以及对 21 世纪初的文化审美现象的社会学透视，使他走在了这一“现代性课题”的前列，并远远超越了他同时代的思想者。

现代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 17 世纪以来出现于欧洲并向世界各地扩散的社会生活方式和组织方式。20 世纪以来，现代性所产生的巨大转型力使人们空前地脱离各种形式的传统社会秩序，这不仅对现代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对人们日常生活存在的基本个人特征也有重大改变，这一现代社会变迁和制度性转变具有全球化霸权扩张的倾向。

不难看到，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知识转型的文化语境中，在科技文明加上消费主义所产生的后现代状况中，“知识—权力”运作者日益失落了主体人格的乡愁和在社会抗争中寻找意义的希望，偏离了真正的人性存在经验之维，使语言成为人与人、人与世界的阻隔疏离。语言背离了真理，而变异为谎言。谎言在维持体制的运转机制中实现了谎言的本体化，即谎言不再是本真生活的背离和扭曲，而是成为现实生活“真实”本身。权力通过语言造就了语言暴政，而语言反过来通过谎言塑造权力神话并连带地带来道德价值的沦丧。作为知识分子首位要素的“语言”已然处在危险之中。新一代知识分子如果不准备重蹈覆辙，则必须重新审视和书写自己的历史。这意味着必须寻找一种真正具有创新和解放意义的“新语言”，才有可能重新书写真正的人的历史。

现代性问题与后现代性问题紧密相关，甚至可以说，现代性

问题是后现代性问题的肇因，而后现代性问题是现代性问题的当代呈现。在二者的复杂关系上，出现了一系列重大的论争。哈贝马斯和利奥塔德现代与后现代之争，是后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甚至可以说，这是德法知识分子 21 世纪以来在中心与边缘、同一与区别、共识与差异、解读与误读、交流与谬误等根本性对立问题上又一次重大论战。

后现代的来临，使哈贝马斯从批判哲学角度出发，考察人们为什么急于通过“现代”这一历史处境走向“后现代”。他想弄清楚，现代性为何成了问题并遭遇到危机？现代性是否已经终结？哈贝马斯坚持认为，现代性是一项宏伟的工程，尚未完成，它具有开放性，远未终结。因此，后现代性是不可能的。哈贝马斯指出，这就是主体性、总体性、同一性、本源性和语言深层结构性所进行的全面颠覆，而代之以非中心、非主体、非整体、非本质、非本源。在哈贝马斯看来，这种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性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必须加以清理，重振现代性。以现代性对抗后现代性的一个强有力依据是，现代化如韦伯所说的“理性化”蓝图是一项未完成的工程，从启蒙时代开始设计定向，但却在具体实践中一再出现偏差而走入歧途。问题的实质在于未能按照科学、道德、艺术各自不同的范式去发展合理的理性化制度。哈贝马斯的选择是：不放弃启蒙思想，而是反过来纠正原设计的错误和实践的偏差，重新调整和完成理性的重建和修复，建立新理性图式——交流理性。

当代文化社会学家布迪厄在后现代风靡一时的世纪末，张扬清明的理性，把理性看成是历史的产物，并强调真正的知识分子，必得独立于各种世俗权力，独立于经济和政治权威的干预。知识分子必须确保精神的独立自主，即要用各种制度化的有序性对话阵地的存在作为自身存在的前提。他坚决反对知识中的地方

主义和宗派主义，坚持要开辟一个自由平等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既排斥那些互相吹捧的小集团，又坚决取缔那些以一些虚假问题在整个文化世界的以讹传讹。因为，真正的知识分子以解放思想为己任，摆脱其职业性的弊端和为自己权力本位而争斗的狭隘性，从而成为一种集体性的对抗符号权力的力量。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既注意自己在社会化进程中的职责，又要独立于官方的政治；既有自由解放，又有价值关怀；既入世而关注现实，又不屈服于任何正统话语的教条。

如果说，20 世纪的现代性反思表征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继承卢梭、马克思所强调的解放、救赎与乌托邦的“高度现代性”的话，那么，在福柯、德里达、罗兰·巴特那里，则表征为继承颠覆性思维方式，即尼采、波德莱尔、西美尔、本雅明等思想相承的“低度现代性”，即关注生活世界内的矛盾变化和揭露现代性的负面效应。那么，布迪厄和吉登斯（甚至似乎可以包括韦伯、曼海姆等）则可以说是以一种反思性态度和实践性策略对现实加以冷静地分析和剔解。因此，不妨称其为“中度现代性”。这三种“现代性话语”方式，在 20 世纪的思想舞台上，彼此错落，相互交织，使现代性问题连带后现代性问题，成为一个无可回避的世纪性和世界性难题。

就文化矛盾而言，在现代与后现代时期，出现了一种文化一元论，或是一种新绝对论、新独断论的复归。思想者应该张扬文化相对主义，即一方面是大文化与小文化的对立；另一方面是西方与东方的对立，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一种自由的、宽容的价值体系中去把握自己。当然，我们反对那些谴责多元主义的人，也反对那些以多元文化主义名义去扼杀表达自由的人，同样也反对那些文化理论的投机者。不妨说，文化矛盾是这个时代的疲惫的尊容，文化矛盾深层次地表现出文化资本和权力话语运作的内

在的矛盾。文化研究应该是揭底，将这种话语权力运作和文化身份改写关系，将文化领域中这种不知不觉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揭穿。

现代性作为当代学术的一个有效的阐释代码或阐释框架，使我们有可能获得一种整体性文化哲学阐释视野。同时，我也注意到现代性话语的“陷阱”，注意其内在权威意向和价值一元论问题。我并不排斥后现代性话语这一当代文化阐释框架，事实上，我们在审理因它而生、因它而显现的矛盾网络时，它的功过应该是清楚的。任何以偏激对偏激，以误读对误读的方式，都无助于后现代性问题的揭示和解决。

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论争中，学术界一方面进行自我哲学话语转型；另一方面，也注重艺术与文化语言符号书写的关系，注重从集体话语到个体话语，从中心话语到边缘话语的语言策略，去把握文化诗学或对话诗学的本质，从而使“语言学转向”成为“文化研究转向”和“文化生态转向”的思想前奏。

## 现代性之后的“太空文明时代”的思想创新

法国当代思想家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将整个社会资本分成三个资本域，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就经济资本而言，每个国家都可以用GDP来量化。今天中国的经济资本日益雄强。在科技一体化和制度并轨化中，中国的和平崛起将对人类的发展有重要的平衡意义。然而，当代中国的文化资本却不容乐观，20世纪过分的崇洋使得中国的文化身份出现了辨认上的危机，文化资本、象征资本严重滞后于经济资本的提升。象征资本建立在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之上，它是一个国家是否是强国形象的辨认标记。经济崛起而文化资本、象征资本下滑，必然

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经济持续增长，所以国际上“中国威胁论”、“中国分裂论”、“中国崩溃论”频频出现；由于缺乏用文化对中国崛起合法性的重新界定和观念软着陆，缺乏用文化对大国崛起以后动向的清晰说明，因而出现了海外种种文化误读。为避免诸种情况之发生，应该下大力气抓文化资本、象征资本的积累和创新，使经济崛起和文化创新的双翼共同提升中国新世纪的强国形象，因此，在新世纪强调东方文化身份表明了中国和平崛起与重铸辉煌具有立场的正当性。

在西方进入后现代社会以后，似乎第三世界成为现代性问题争论的争斗之地。这存在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只要将西方现代性作为一个不断追逐的目标，那就只能永远跟在西方后面而难以超越。于是，现代性成为第三世界文明作为次等文明的证明。因此有必要重新分析人类发展的规律，从而将未来眼光放到现代性之后的新文明时代问题和形态研究上去。

我不认同丹尼尔·贝尔将人类文明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也不完全赞成杰姆逊那样将人类文明区分为前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因为这类区分不乏西方中心论、文化的优越感。我认为大陆文明、海洋文明、太空文明时代的身份改写对中国而言，具有全新的阐释意义。

在我看来，人类文明的历史可以分为陆地文明、海洋文明、太空文明三个时代。在全球陆地文明形态中，中国是最先崛起的文明之一，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最强大的国家。在西方处于奴隶制度的时候，中国已经进入封建社会，比西方要先进得多，从而在两种文明相遇的时候进行了中国领先式的对话。作为东方大国，中国不仅发明了纸、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并在哲学、天文、工业、农业、医药、瓷器、园林、航海、茶叶、冶金等方面远远领先并影响了西方。可以说，如果没有纸的传播，

西方的文艺复兴就是不可思议的；没有指南针，西方人的航海和地理大发现就不可能实现；如果没有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西方只能在羊皮上印供贵族阅读的沉重的《圣经》，西方的大学也不会如此迅速地成为平民的知识圣殿。然而，在海洋文明崛起的时代，中国成为“停滞的帝国”而被抛在身后。中国不仅在整体上感受到自我身份的失落，而且痛感亡国灭种的灾难。在启蒙与救亡中中国开始了自己新形象的寻求，并在整体上形成百年西化的“现代化”文化价值趋向。西方成为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实体和文化身份重新洗牌的场所，成为傲视群雄的经济文化帝国主义中心。当然，现代化不是美国化，现代化是各个国家自身的现代化。现代化也不是全盘西化，而是全世界脱离物质贫穷，脱离思想困境，脱离低下的生产力，是整个人类从陆地文明走向海洋文明的进程。

人类文明没有停滞。以东方为代表的陆地文明成为人类文明最初的强盛，大唐辉煌的盛景和阿育王朝的鼎盛，令人记忆犹新。随着海洋文明——工业革命的到来，曾经辉煌的“龙”“象”两个大国，几乎同时迷失了自我身份。但是在太空文明到来之时，两个近邻的大国开始发出以经济崛起为先导的文明复兴的吁求，引起了整个世界对于两国竞争力和战略的空前重视。不妨说，以西方为中心的海洋文明形成了人类文明中级阶段的全球化强盛，那么，东西方互相促进并曾给对方以新文化种子——东方文明曾经在很大程度上启蒙、影响、推进了西方文明，西方现在反过来传给东方以生命科学、纳米技术、电子技术等高端文明，使东方文明走向现代。进入现代化之后的人类，没有停止探索，于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出现了——“太空文明”。据专家统计，大量早期的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成果已经转化为产业，成为空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空间计划获得的技术已经为美国经济

增加了2万亿美元资本。在21世纪的头10年,预期的高额利润将吸引大批资金注入到全球空间工业,大约为6500亿—8000亿美元。到2010年,美国在空间的资产将达到5000亿—6000亿美元,大约相当于现在美国在欧洲的资产。从500多年前的明朝一个叫万户的中国人第一次利用火箭勇敢地尝试着飞天,到50年前西方人进入太空,到21世纪中国载人飞船上天,使得中国迅速成为“太空俱乐部”第三人。中国作为地球村公民在太空文明领域做出了艰苦的努力。紧接着中国开始了登陆月球计划及实施,计划实现三次月球探测后进行载人登月,推动了太空文明的全新发展,为人类文明创新和向未知的新领域挺进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毋庸置疑,在大陆文明时代,中国是领先者,西方是落后者;在海洋文明时代,西方是领先者,中国是落后者;而在太空文明时代,中国与西方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向外层空间浩瀚宇宙的广度和深度飞升,为人类文明的明天拓展出新的天地。如果说中国错失了500年前大航海时代并遭受了200年的苦难,那么,中国没有错失太空文明时代。东西方将在太空文明时代重新审视对方,明白任何一种文明形态都不可能长盛不衰,一统天下。只有不断地本体创新、探索发现、消除误读,才能使中国和平崛起并重振辉煌,才能使大陆文明的优胜者和海洋文明的优胜者在太空文明这一新的文明形态下互体互用,互补互动,获得双赢。

中国在太空时代必将通过文化创新改写自己的身份。在重新发现中国文化的重要性时,也要注意其弊端,应避免再次落入阿Q的“老子先开闢”的精神误区。同时也不能虚无主义到将自己的文化看成一团漆黑或一无是处。一个世纪以来,全球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把自己的祖先骂得这么惨。哪个民族没有自己

的文化弊端？德意志没有吗？日本没有吗？美国没有吗？中国人什么时候能把“审父”变成“审己”呢？说到底，中国的文化对手不是西方，重新认识差异性的东方不是针对西方，而是针对整个人类的文化盲点。我主张历史性—民族性—人类性，反对过激的民族主义和部落主义，伸张宽博的“世界主义”或“人类主义”，坚持人类之“体”，世界之“用”，达到东西方文化的平等互动。

可持续地超越现代性的弊端，使得中国同后现代性社会能够同时站在太空文明时代的大门，成为新世纪中国学者一个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意味着要反省现代性的根本问题域，厘清后现代的正负面效应，要弄清现代性对全球化中的后殖民倾向，这样才能确定中国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立场，并在太空文明时代与西方发达国家形成科技和文化良性互动，在文化对话上不成为次等文化，而是互体互用，彼此欣赏差异性的文化，打破全球现代性带来的同质化，形成世界范围的“世界主义”价值观和多元并存的文化观。

近十几年来，中国学术界对现代性问题进行了不少相当有价值的探讨，使学者逐渐摆脱了对现代性的盲目崇拜，开始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和批判性的写作。一批博士论文也涉足这一前沿话题，其创新性和前瞻性让人欣慰。这些年轻的博士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和准备，大致确定了各自的研究方向，对现代性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分别撰写出《文学现代性》、《现代性的秩序》、《现代性叙事与人本话语研究》、《现代性叙事与媒介话语研究》、《审美现代性的歧义与悖论》、《审美现代性的颠覆与重建》、《审美现代性的否定辩证法》、《审美现代性与文化政治美学》、《审美现代性与日常生活美学》等九部专著，组成一套“文学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当我读到这套丛书

的书稿时，尽管其中仍然有不足之处和可再商量之论，但其率真和新锐之思，又使我深感后生可畏。愿他们的思考成为中国现代性问题中有活力的声音，并能够在新世纪中国现代性经验成为人类现代性经验一部分的进程中，坚持不懈地拓展东方文化精神的新维度。

2006年6月6日于北京大学